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危言三種

〔清〕鄭觀應 湯震 邵作舟

撰 明在 鄒振環 整理

盛世危言鄭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命草草勢人久無以報既瓜代移其書悉心正訂間亦參以鄙見陶原本並勸其早付手民出以問世夫盛衰倚伏之機即天人相通之故懦夫俗士往往蒙昧其本原相與粉飾而委順之遇無由出人定勝天之功效皆坐其不能見機於早也惟然而陶齋之書之切直洞中天時局之隱微斯不啻李將軍射虎之矢靡堅不摧若采而見諸施行則女媧氏補天之石不是過也方今運會中興聖明在 鄒振環 整理今而合古必能容長沙之忠直采治

出
力
出
遠

書
還

見
補
救
無
從
則
始
歎
惜
爲
前
知
之
言
未
能
見
用
亦
復
何
及
此
吾
宗
陶
齋
觀
察
盛
世
危
言
所
由
作
也
陶
齋
於
余
誼
同
宗
生
同
里
聞
幼
讀
書
知
大
義
恒
以
帖
括
爲
恥
乃
棄
去
學
陶
朱
術
比
同
客
淞
濱
听
夕
過
從
結
爲
道
義
交
約
以
有
過
相
規
有
善
相
輔
沉
瀝
誠
相
得
也
陶
齋
乃
出
其
枕
秘
數
冊
就
正
於
余
則
之
所
經
論
中
外
情
勢
商
榷
古
今
利
弊



危言三種

〔清〕鄭觀應 湯震 邵作舟 撰 鄒振環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危言三種 / (清)鄭觀應 湯震 邵作舟撰, 鄒振環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2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ISBN 978-7-5325-7113-0

I. ①危… II. ①鄭… ②湯… ③邵… ④鄒… III.
①改良主義—中國—清後期—文集 IV. ①D092.5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53398 號

本書由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助出版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危言三種

[清]鄭觀應 湯震 邵作舟 撰

鄒振環 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25 插頁 6 字數 355,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7113-0

K·1821 定價: 6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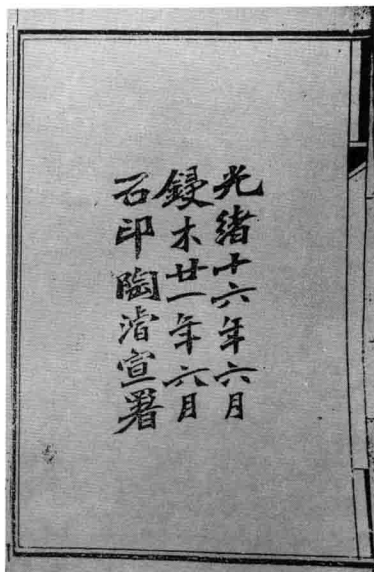
《盛世危言》五卷本牌記



《盛世危言》五卷本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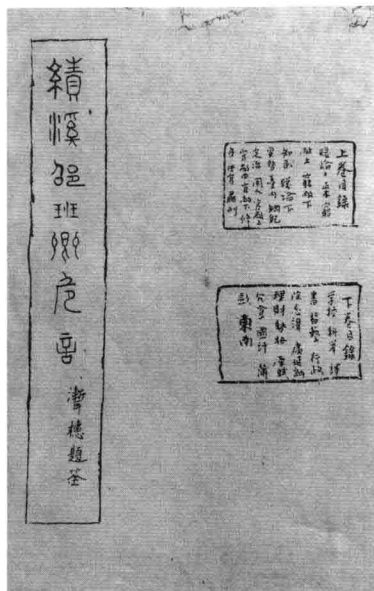
《危言》四十卷本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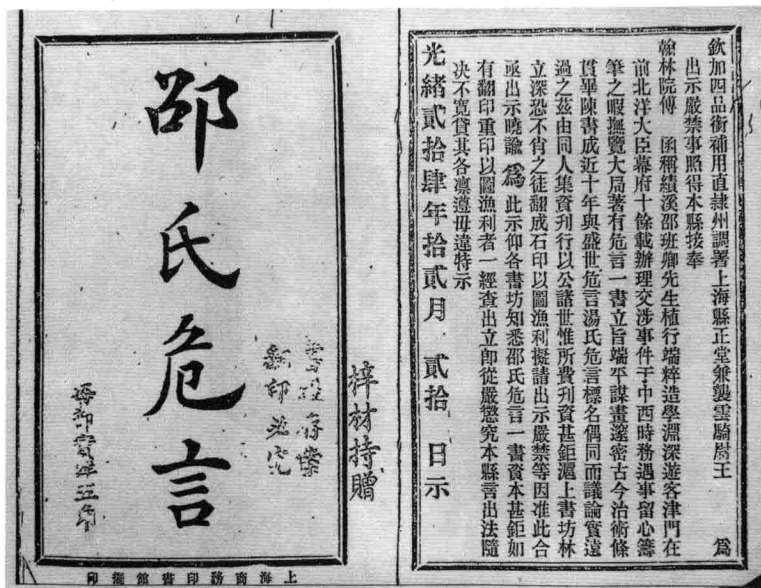
《危言》五十卷本牌記



《邵氏危言》嶺海報館本扉葉



《邵氏危言》嶺海報館本封面



《邵氏危言》商務印書館本書影

《危言三種》導讀

鄒振環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東來，「互市之開，天將合地球而為一」^(一)，中國社會積弱之弊日益暴露，「吏治惰偷，日以益甚，賄謁公行，教術蕩盡，盜賊充斥，姑息欺蒙，民積痛無所愬」^(二)。古老而變化緩慢的傳統，在西方現代文明和強勁歐風的衝擊下步步退卻，進入了一個所謂「開闢後未有之奇局」^(三)。中國的有識之士，紛紛尋求對策，逐漸形成對中國時局的新觀念和中國作為世界之一國的新認識。於是，始有龔自珍「自改革」的呼籲，繼則林則徐詳究域外強敵之由來，再有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主張的提出，以及馮桂芬、郭嵩燾等主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洋務思想，但國勢仍未見明顯起色。於是，以古老的傳統來詮解西學從而達成改革政制以求自強者前仆後繼，一些表述改革思想，規劃變法措施之專著相繼問世，其中最著名的當推鄭觀應、湯震、邵作舟的「三危言」。

本書收入的被稱為「三危言」的三部著作：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湯震的《危言》和邵作舟

(一) 湯震《危言·書院》。凡引用本書五十篇本《危言》，不另出注版本和頁碼，下同。

(二) 邵作舟《邵氏危言·憂內》，光緒辛丑年（一九〇一年）嶺海報館本。凡引用本書收入的嶺海報館本《邵氏危言》，不另出注版本和頁碼，下同。

(三) 湯震《危言·變法》。

的《邵氏危言》，是近代中國宣傳改良政治、變法維新的論著中影響最大、且題名《危言》的三種。⁽¹⁾「三危言」之作，兩部完成出版於甲午戰爭前，一部則出版在甲午戰爭後。湯震《危言》撰寫最早，肇端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歷時四年，至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初稿完成，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面世，後兩年始有鄭觀應之五卷本《盛世危言》的初版（一八九四年），又四年才有邵作舟之《邵氏危言》的問世（一八九八年）。

「危言」一詞，首見於《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²⁾危言者，直言也。⁽³⁾湯震在《序言》中說：「有道危言，尼山之旨，刺取其誼，以名吾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顯然，湯震所說「危言」，即「正直之言」。或有以為鄭觀應從《易言》到《盛世危言》，書名的變化反映了其思想的巨變：「危言者，危險萬狀，不易說出的建言，又是危機深重，不得不講的建言。」⁽⁴⁾筆者以為，將晚清的「三危言」，視為同時具有「正直之言」、「危機時代」不易說出的建言「及」不得不說之建言，恐怕意思就比較全面了。

(1) 近代首次將三種《危言》並提，見之一八九八年商務印書館版《邵氏危言》撫時感事生序，作者在敘言中稱：「顧《危言》之作，前有湯鄭，一時著述標目偶同，而經其宗旨，實各異趣，友人羅君閑論三書，謂香山所作多貨殖之譚，山陰新論極才人之筆，而粹然儒術，厥維此編。」

(2) 《論語·憲問》。

(3) 范曄《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序》稱：「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意即不畏危難而建正直之言。

(4) 高華《鄭觀應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建言》，載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紀念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二〇〇三年，頁三三—三八。

五卷本《盛世危言》中雖然沒有提及湯震的《危言》，但鄭觀應一定仔細讀過的。^①鄭觀應以《易言》的體例與寫作脈絡，改變了原來的書名，易之《危言》並加上了「盛世」二字，顯係為與湯震《危言》相區別，但卻因此創造了漢文文獻中至今仍流行不衰的一個關鍵詞。邵作舟撰寫《危言》時是否讀到過前兩種《危言》，尚難確定，但作者將自己的姓氏冠之書名前，顯然也是為了避免與另兩種《危言》相混淆。

作為《危言》三種中單一的文本，《盛世危言》和《危言》尚有標點本，^②而《邵氏危言》尚無舊式斷句或新式標點。《危言》三種文本，《盛世危言》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厚，^③湯震《危言》的研究略顯薄弱，^④而邵作舟及

① 如湯震《危言·保朝》一篇討論關於朝鮮問題的各種對策方案，其中有從均勢說出發構想的方案，為五卷本《盛世危言》的《防邊中（保朝鮮）》篇後記提及，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四四八；《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在五卷本的基礎上增加了公舉、典禮、旗籍、釐捐、鹽務等傳統經世之學領域的題材，是受湯震《危言》題材範圍影響的痕跡，參見鄭觀應評傳（下），同上，頁五〇七。

② 五卷本《盛世危言》最早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收入的標點整理本；之後標點本還有一九九四年遼寧人民出版社本，一九九七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本，一九九八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本，一九九九年北京藍天出版社本，二〇〇一年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本，二〇〇二年華夏出版社本等。其中或重新編排，或夾入評論，或刪減文字，難見五卷本原貌。五十篇本《危言》僅有收入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蕭山文史資料選輯（四）》（蕭山政協一九九三年，頁二一五—三一三）鄭雲山的點校本。

③ 最早系統研究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的是夏東元，他的系列研究著作有《鄭觀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鄭觀應》（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和《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資料整理有《鄭觀應集》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之後重要的成果是其學生易惠莉所著《鄭觀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還有若干關於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研究的重要成果，載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紀念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二〇〇三年。該書承董少新教授贈送，謹此致謝！

④ 關於湯震生平及其《危言》研究的主要成果，見之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蕭山文史資料選輯（四）》，蕭山政協一九九三年；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湯壽潛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關於湯震作為立憲派領袖在保路運動中之作用的若干論文，多見載于賢勇編《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集粹》上、下卷，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其《邵氏危言》的研究至今成果有限。^①筆者向來認為，歷史學應以具體而微的個案實證研究為基礎，但研究主題卻有其縱向和橫向的關聯性，「三危言」作為晚清學術思想發展序列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其思想變化的多維聯繫，似乎並未通過個案的研究得到充分的揭示。編者選擇「三危言」中最富代表性的三個文本合為一書，進行編校整理，無疑更便於我們分析和解讀作為近代學術名著的「三危言」及其形成之特殊現象。

一、傳統裂變中的三種知識精英

數千年來以家族為宗法本位、以儒家倫理與政治一體化為基礎的政治模式、以華夷之辨為世界觀念的中國傳統，在十九世紀已經受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無處不在的洋貨和通商口岸中展現的政治體制的強烈衝擊，正在緩慢地發生著裂變。面對著逐漸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不同的知識精英紛紛走上政治舞臺，發出了代表著自己所在知識階層的聲音。

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年），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羅浮倚鶴山人、慕雍山人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這是中國近代一位出生在頗得西方風氣之先的廣東，出身於「買辦之鄉」而逐漸走上維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也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初期的一位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家。青少年時代，「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於商，日與西人遊，足跡半天下」^②。懷著對新世界的嚮往，鄭觀應從廣東來到上海，踏上一條為正統士大夫完全鄙視的人生之路。他一方面在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一方面向叔父學習英語。在新德洋行期間他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礎。之後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第一

① 關於邵作舟生平及其《邵氏危言》的討論，筆者寓目的主要有鍾祥財《邵作舟經濟思想初探》（載《江淮學刊》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的相關章節。近期主要成果有葉順意的《邵氏危言研究》，湖北大學碩士論文（二〇一〇年五月）。

② 《盛世危言》彭玉麟序。凡引用本書五卷本《盛世危言》，不另出注版本和頁碼，下同。

流的大洋行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時就讀於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辦英華書館夜校部，學習了兩年英語。他根據切身體會寫道：「今日時勢，非曉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①在傅蘭雅這裏，他不僅學習了英文，還「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②。一八六八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失去了買辦的位置，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一八七三年他受聘擔任太古洋行輪船公司總理，並在牛莊、上海等地開設商號、錢莊。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的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使太古經營頗為紅火。^③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這期間他多次捐官，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的認識，是鄭觀應人生的一個轉捩點，也是他事業的鼎盛期。受李鴻章之聘，他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後任總辦。一八九六年受張之洞委任，出任為漢陽鐵廠總辦，後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曾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一九〇六年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被盛宣懷任命為會辦，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辛亥革命後，鄭觀應自川回滬。他的一生都是在動盪和戰亂中度過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充滿著傳奇和爭議。沿海工業化的發展和現代工

① 《香山鄭慎餘堂侍鶴老人囑書》，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排印本，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五十七（下凡引用該版，僅注作者、書名與頁碼）。

② 鄭觀應《果商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查員互相砥礪事》，參見《盛世危言後編》卷八，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六〇四。

③ 夏東元《鄭觀應傳》，頁七一—一〇。

業部門的出現，造就了一批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緊密聯繫的工商階層知識精英，我們姑且稱之為「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鄭觀應徜徉於洋場，周旋於工商界，代表著此一時期見多識廣的沿海洋務派知識精英的聲音。他們是近代中國最早的求富求強的積極鼓吹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鄭觀應把自己不斷與歐風接觸的經驗和對西方國家富強之本的理解，寫成《救時揭要》一書。後又將發表於《申報》、《中西聞見錄》等報刊中的三十六篇文章寄呈時在香港辦《循環日報》的王韜就正，王韜為其付印，名曰《易言》，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在香港出版。兩書是鄭觀應變法維新思想的早期雛形，其核心就是「變革」，即變革清政府為代表的舊傳統，瞭解和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在《易言》的基礎上擴寫而成五卷本《盛世危言》，這是鄭觀應以一生心血撰寫的一部全面而系統的改革社會、宣傳自強求富、維新變法的重要著作。《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卷首，先後有鄭藻如序，該版還有吳廣霈、楊毓惲「先後參定」後所寫的跋，以及陳熾「癸巳七月」的序言，^①由

① 參見收入本書的《盛世危言》鄭藻如序、陳熾序、吳廣霈和楊毓惲跋。鄭藻如（一八二七—一八九四年），字玉軒，廣東香山人，係鄭觀應同宗之兄。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由容闈舉薦於李鴻章，被任命為上海機器製造局幫辦。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任津海關道。七年賞三品卿銜任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大臣，任內保護華工和維護華僑利益。參見鄭天挺、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下》，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四七三。陳熾（一八五五—一九〇〇年），原名家瑞，字克昌，號次亮，江西瑞金人。光緒舉人。歷任戶部郎中，曾遍遊沿海各商埠，並考察香港、澳門，深研經濟學，廣泛結交通曉洋務者，曾將其心得著成《庸書》，後入編有陳熾著《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吳廣霈（一八五五—一九一九年），作一八五四—一九一八年，字瀚濤，瀚濤，別號杏時，劍華道人等，安徽涇縣人，世居揚州。早年師徐壽朋，一八七七年隨何如璋使日，一八八一年隨馬建忠赴印度參與鴉片談判，一八八二年作為鄭藻如使美隨員，一八八九年隨徐壽朋使朝，一九〇一年隨蔡鈞使日，民國後參與編纂清史稿。著有《南行日記》、《石鼓文考證》、《天下大勢通論》等（參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三三九、三四九，易惠利《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三三三）。楊毓惲，字然青，廣東大埔人。早年肄業於上海格致書院，曾多次參加格致書院考課並多次獲獎。維新運動期間赴京，撰有《富強芻議》等，名聲噪於京師。後有劉坤一保於經濟特科，任交通部主事。光緒末年入北洋洋務局，纂輯《約章成案匯覽》，撰著還有《格致治平通議》、《中西權度合攷考》等（參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二八五）。

此不難看出，該書是如何得到了這一批具有沿海生活和工作經歷，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工商知識精英」的歡迎。

較之鄭觀應年少十四歲的湯震（一八五六—一九一七年）是浙江山陰（今蕭山）人。後更名壽潛（因湯壽潛在五十篇本《危言》自敘中署名「湯震」，本文非引文均稱「湯震」，字蟄仙，「早歲穎異，以文學見稱」，「銳於學而善變，《說文》、《爾雅》，均有所纂述」。但他更重時務，考求「海國情狀」。^①十九歲起花費十多年的時間博覽並抄摘《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文獻，^②而且對《大清會典》也極為熟悉，《危言》中多次加以引用。^③由此，習聞國政之得失，喟然論列時弊。^④曾出任浙江金華書院山長，主張教學以實用為務。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入山東巡撫張曜幕。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三十七歲的湯震與張元濟、蔡元培、王辰科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授安徽青陽知縣。三十歲以後，有多次做官的機會，但他或旋任旋辭，或辭而不就。八國聯軍入侵，曾遊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東南互保」。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任兩淮鹽運使，但仍以養親之故寓居上海。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發動旅滬浙江同鄉抵制英美侵奪蘇杭甬鐵路修築權，倡議集股自辦全浙鐵路。七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任總理，是浙江保路運動的領袖。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

① 《危言》吳公亮跋。

② 參見陳志放《湯壽潛年譜》，載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蕭山文史資料選輯（四）》，蕭山政協一九九三年，頁六一—一六四（下凡引用該書，僅注書名《湯壽潛史料專輯》及頁碼）。

③ 參見《危言·節流》、《危言·兵制》等篇。

④ 張謇《湯君蟄先生家傳》，載《湯壽潛史料專輯》，頁一二五—一二八。

與張謇、鄭孝胥等人聯合江、浙、閩紳商二百餘人，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敦促清廷早日立憲。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任浙江諮議局議長，曾與張謇、湯化龍、譚延闓等發起和組織聯合會請願，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辛亥革命爆發，杭州新軍起義，他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在任期間，他又聯合陳其美、程德全等通電起義各省，商議成立聯合政府。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命湯壽潛為交通部部長，未到任。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他曾致電反對，晚年回歸故里。湯壽潛一生極其儉樸，不講究吃穿，不追求物質享受。據曹聚仁回憶，他所知道的湯壽潛是最懂得洋務的維新人物，是一位穿著土布短褂的「土老兒」，手上拿了一把油紙傘，脚上一雙蒲鞋，十足的莊稼人打扮，卻在都督府辦公，有「布衣都督」之稱。^①著有《爾雅小辨》、《說文貫》、《理財百策》、《三通考輯要》等多種。熊月之認為，湯壽潛是晚清浙江山水哺育出來的飲譽朝野的思想家，是江南士紳文化的代表。^②這一群體大多曾經致力於舊學，有成就課藝的經歷，但他們又多認識到空疏的理學和瑣屑的考證無補於社會的改革，於是將主要精力用於賦稅、農政、河工、漕運、鹽法、邊防等實學的考訂。江南的寧波、上海地處晚清西學傳播中心，得風氣之先，士紳階層對西學的瞭解又較之其他地區為深厚和全面，《危言》雖由當時尚無顯赫仕宦經歷的湯震完成，但他提出精減冗員、改革科舉、推廣學校、開發礦藏、修築鐵路、興修水利、加強海軍防務等改革主張，代表了此一時期江南士紳文化群體的聲音，被視作「浙江實學園地中的奇葩」^③。

① 曹聚仁《記湯壽潛其人》，載氏著《聽濤室人物譚》，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二五十二七。

② 參見熊月之《湯壽潛與浙江人文傳統》，載《同濟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③ 熊月之《湯壽潛與浙江人文傳統》，載《同濟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爲該書刊刻和作序的陸學源^①、吳忠懷^②以及高度讚美《危言》的張謇等，都屬於江南活躍的士紳代表。

邵作舟（一八五一—一八九八年），安徽績溪人，名運超，字班卿。他比鄭觀應年少九歲，較之湯震年長六歲。與前兩位相比，邵作舟的生平資料非常有限，目前僅知道他幼隨父居甘肅任所，讀父書，有枕戈待旦之志。一八六三年父親死於回民起義的戰火之中，隨即他返里求學。曾遍讀唐宋大家，後再攻六經諸子、秦漢之文。「好爲艱澀幽險之文，繼好爲駢四儷六之文」。蟄伏小城的他不滿於邑中諸儒窮經皓首讀經的風氣，發出了「窮鄉僻壤中，苦於無所師法」的感歎，於是求學於杭州，與趙之謙、程蒲

① 陸學源（一八五四—一九〇〇年），字仲敏，號竺齋、駕齋，爲陸心源堂弟，浙江歸安（今湖州）人。邑庠生，四品銜，累官刑部陝西司郎中，江西司主稿，司務庭行走，會典館協修。補知府後以道員用，並加鹽運使銜，並加一品銜。著有《領恭軒文存》。是陸心源收藏與著述的得力助手。參見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六年，頁一四二。

② 吳忠懷，初名穎炎，後更名忠懷，字澄甫，號亮公，約生於咸豐初年，浙江諸暨西巖琴弦人。生有異稟，爲人稱奇。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恩科舉人，是年，北上受業於李慈銘，旋寓上海點石齋，輯有《經策通纂》（光緒十四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與諸多博學碩士接觸頻繁，文名益著。甲午以後目睹朝中士大夫守舊辱國，會同陳志三、湯震上書朝廷，陳述革新之見，不獲准。南返，徐錫麟、秋瑾慕其名，推襟論文，深爲契合。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返浙，曾參與創辦《浙報》（即《浙江五日報》），發表《述創設浙報宗旨》。他主張革新傳統教育，改舊式書院爲新式學堂，倡設翊忠公學。一九〇一—一九一七年，先後任諸暨師範講習所所長、諸暨縣勸學所總董、教育會長等職，對革新諸暨傳統教育多有建樹。參見《浣水流韻諸暨歷代詩詞》卷二：徐道政《諸暨詩英凡例》（夏宗德注）。感謝陸玲女士提供相關資料線索。

孫等結為學友。^{〔三〕}研讀龔自珍諸集，關心時務，但他卻在科場上連連報敗，「屢試於鄉，不售，無憾色」^{〔四〕}。陶模等欲薦於朝，但「邵氏固辭」。一八八二年，他任職於天津支應局，於局務總理李興銳^{〔五〕}交往尤篤，李之公務皆取決於邵氏。他「遊學津門，在前北洋大臣幕府十餘載，辦理交涉事件，於中西時務遇事留心」^{〔四〕}。「久參戎幕，籌筆多暇，撫覽時局，著為私議」，成《邵氏危言》，啓迪民智。^{〔五〕}又作《論文八則》，精闡地總結中國古文創作歷史與手法，可謂「文章學」之濫觴。甲午戰前，他「與李文忠公言皮口駐兵」，然

〔三〕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年），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揭叔，號悲庵、無悶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代著名的書畫家、篆刻家，咸豐九年舉人，官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知縣。其書法初法顏真卿，後專意北碑。篆隸師法鄧石如，自成一派。著有《悲庵剩墨》、《悲庵居士詩剩》、《梅庵集》、《輞雅堂詩話》、《補寰宇訪碑錄》等。參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六三一—六三二）。程秉鈞（一八五〇—一八九一年），又名秉鈞，字公勛，號浦蓀，又號龔學齋，安徽績溪人。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年）舉人，應視學廣東的學使汪鳴鸞之邀，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隨汪至瓊州（今海南島），將歷代入瓊人士之詩歌編為《瓊州雜事詩》一編。庚寅（一八九〇年）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精通音韻、訓詁，潛心研究金石，著有《績溪志乘》、《淮南子補注》、《龔定庵年譜》、《龔學齋古今體詩》、《知一齋尺牘》、《丹荃館詩餘》、《少思長室文存》、《瓊州雜事詩》，未成者有《公穀考義》、《漢學師承記續記》等。與邵作舟、胡鐵花並稱「晚清績溪三奇士」。參見楊林《瓊州雜事詩》述略，載《海南師院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張小坡《邑小士多，代有聞人：績溪厚重文化的教育因素》，載《新華月報》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

〔四〕《邵氏危言》胡衍鴻序。

〔五〕李興銳（一八二七—一九〇四年），字勉林，湖南瀏陽人。咸豐間以諸生隨曾國藩辦理湘軍軍需，頗為所重。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任直隸大名府知府。旋調江蘇，與彭玉慶規劃長江水師。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督辦上海機器製造局。一八八五年參加查勘中越邊界。後歷任津海關道、山東

東海關道、廣西布政使等職。一九〇〇年擢江西巡撫。一九〇二年奏請開特科，整學校、講武備等。一九〇三年署閩浙總督，整肅吏治、整頓釐捐機構，釐定常備軍制，創設農工商局等。次年署兩江總督，旋病死。參見鄭天挺、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下》，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二三七。

〔四〕《欽加四品銜補用直隸州調署上海縣正堂兼龔雲騎尉王為出示嚴禁照》，載《邵氏危言》，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八年版。

〔五〕《邵氏危言》胡衍鴻序。

「不聽，復進圖說明之，卒不能從」，「旋日人果於皮口進兵，於是京津間，謂公料事如神，識與不識者，皆知公名」。甲午戰後，他認為和議雖成，但「吏治不修，胎亂未去，京津不久恐有大亂」。^②光緒帝頒下「改革諭旨」及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康有為等條陳摺片九件，要求將軍督撫們各就本地情形悉心籌畫，引發了一場關於戰後改革問題的大討論。據翁同龢日記稱胡燏棻奏摺實際上係「邵班卿（作舟）和翰林王修植捉刀代筆」。^③一八九八年的元旦，年僅四十七歲的邵作舟在鬱悶中卒於天津任所。雖然邵氏尚不屬於全國的聞人，但在地方上也名噪一時，與程秉釗、胡傳^④，被譽為晚清績溪三奇士之一。他與胡傳是好友，胡傳曾經寫過一封信給邵作舟，與其討論臺灣的海防問題。^⑤不難看出，邵作舟與胡傳一般，屬於尚未獲取很高功名而以才學游食於仕宦幕府的士大夫，是未能進入清政府的核心圈但卻在地方上扮演着儒家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的角色，《邵氏危言》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代表着民間知識者的聲音。

〔一〕關於邵作舟的生平，參見葉順意《邵氏危言》研究，湖北大學碩士論文，二〇一〇年五月，頁二二三。

〔二〕參見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五冊，頁一八一二。

〔三〕胡傳（一八四一—一八九五年），號鐵花，安徽績溪人，胡適之父。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生員，一八六八年春入上海龍門書院治輿地學，重視邊疆史地。一八八一年實地考察東北關隘，如吳大澂幕府，在鄭州治河，後包舉以直隸候補知州分發各省候缺任用。一八九一年被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調臺灣，一八九二年任全臺灣營務處總巡，一八九三年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領海後軍各營，一八九四年補授臺東直隸州知州，同年甲午戰爭爆發，應總兵劉永福私約而留臺抗日。一八九五年病故於廈門。參見唐德剛編校譯注《胡適英文口述稿·胡適的自傳》，載葛懋春、李興芝編輯《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二一三—二一八。

〔四〕參見胡傳著，羅爾綱、胡適校編《臺灣紀錄兩種》，下冊，頁四七，轉引自黃錦珠《邵振華及其〈俠義佳人〉》，載《清末小說》二〇〇七年第三〇輯。邵振華（一八八一—？）為邵作舟之文，筆名，績溪間漁女史，後嫁浙江桐鄉勞乃宣之子勞幹（闇文）。著有四十回長篇章回小說《俠義佳人》（商務印書館版）。

鄭觀應、湯震和邵作舟是在近代變局中分別代表了晚清身世和遭遇不同、閱歷和學問各異的三種不同知識精英的思想力量，正如籌款刻印《邵氏危言》的撫時感事生所言：「顧《危言》之作，前有湯、鄭，一時著述標目偶同，而繹其宗旨，實各異趨，友人羅君閑論三書，謂香山所作多貨殖之譚，山陰新論極才人之筆，而粹然儒術，厥維此編。」^①如此概括《危言》三種，似嫌簡單化，但確乎道出了「三危言」在談洋務、談變革、談維新、談教育、談實業、談資本的過程中，有着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代表着近代傳統裂變過程中以資救世的三種不同的聲音。他們面對變局都具有時代的敏覺，發出「危言」以警悟世人，作為三種不同知識階層的一得之見：一是見多識廣的出生於沿海的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一是與傳統經世派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江南士紳文化群體的代表，一是地方儒家知識分子的意見領袖。雖然「三危言」有各自所代表群體有關時局討論的不同對策，但又有其在政治改革中不偏激、不冒進，遵循傳統而又不拘泥於傳統，懂得學習西方之重要，而又不迷信西學的共同特點，當改革沒有最後絕望時，他們又抱持着一種絕不輕言放棄的不屈的近代精神。

二、以資救世的「三危言」版本述略

知識階層在晚清屬於一個渙散的群體，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知識系統，「以資救世」是「三危言」共同的特徵，正是這一特徵使之在近代成為影響廣泛的不依附於任何政治權威的獨立文本。「三危言」都有至少兩個以上的刊本，鄭觀應《盛世危言》、湯震《危言》又有着繁複的版本問題。「三危言」在本

① 撫時感事生《邵氏危言》敘，《邵氏危言》，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